

CIHAI JISHI

辭海紀事

李春平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CIAHAI JISHI

解海紀事

——

——



發揚一絲不苟字斟句酌的作風
嚴謹的“辭海”精神為提高中華
民族的文化素質而努力

祝賀“辭海”一九八九年版問世

江澤民

一九八九年三月十三日

●江澤民同志十分關心《辭海》編纂工作，《辭海》（1989年版）問世，他欣然題詞，肯定了“辭海精神”。

祝賀一九九九年版辭海出版

江澤民

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於上海

●1999年9月26日，江澤民同志接見辭海編輯委員會主編和副主編，並高興地在《辭海》（1999年版）彩圖本上題詞祝賀。



●舒新城 (1893-1960)

《辞海》第一任主编

出版家、教育家。湖南溆浦人。先后担任中学教员和大学教授。1928年起，主持编纂《辞海》工作。1930年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兼图书馆馆长，曾一度代理总经理。建国后，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主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为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教育组成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主编辞书35年，著作近50种，主要有《中华百科全书》、《实用教育学》、《心理学初步》、《人生哲学》、《道尔顿讨论集》等。

舒新城

●陈望道 (1890-1977)

《辞海》第二任主编

语言学家。原名陈参一，浙江义乌人。中共党员。1915年留学日本，1920年春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为我国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同年参加创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并任《新青年》杂志编辑，1923-1927年任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1934年参加发起“大众语”运动，同年主编《太白》半月刊。建国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华东高教局局长、复旦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等。著有《修辞学发凡》、《美学概论》、《因明学》等。



陈望道



●夏征农

《辞海》1979年版、1989年版、1999年版主编。

1904年生，江西丰城人。先后就学于金陵大学、复旦大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主编《新认识》。历任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长，苏中公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部长，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征农文艺创作集》、《征农文艺散论集》、《征农诗集》等。

夏征农

罗竹风



●罗竹风 (1911-1996)

《辞海》1989年版、1999年版常务副主编。

山东平度人。1931年起参加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平度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东大学教务长、教授，华东和上海市宗教事务处处长，上海市出版局局长，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市语委主任，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等。主编有《汉语大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 (1949-1976)》等。有文集《行云流水六十秋》等。

《辞海》版本



● 1936 年版



● 未定稿



● 1979 年版三卷本、缩印本和分册



● 1989 年版三卷本、缩印本和分册



● 1999 年版彩图本、普及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跨越新世纪的文化准备	3
1. 战前总动员	3
2. 时代需要一部《辞海》	9
3. 徜徉在词条中的生命之舟	17
4. 在新的起点上	32
第二章 文明的星光	44
1. 历史回眸	44
2. 十年草创	48
3. 南京—杭州—上海	53
4. 夹缝中的幸运儿	58
第三章 艰难的“未定稿”	67
1. 神圣的使命	67
2. 满城争说编《辞海》	70
3. 浦江集中	82
4. “未定稿”的诞生	99
第四章 更能消几番风雨	113
1. 在“好人不多”的地方	113
2. 恐怖的辞海园	119
3. 批判中的修订	128

4. 奇特的组合	137
第五章 重铸辉煌	147
1. 百日突击战	147
2. 《辞海》时代	156
3. 这里无级别	168
4. 诗人兴会更无前	173
第六章 辞书界的一场风波	178
1. 辞书界的震惊	178
2. 王同亿其人	187
3. 判决前后	195
第七章 辞海人与“辞海精神”	206
1. 繁重的苦力与崇高的智者	206
2. 还历史本来面目	215
3. 谁为生前死后名	223
4. 辞海人和辞海精神	233
写在后面的感言——代后记	246
附：1. 辞海编辑委员会名单	254
2. 辞海编辑委员会会议要览	262

引 言

……这是一部博大雄奇、魅力无边的大书。从 1915 年动议编纂伊始,几乎横贯了整个 20 世纪。八十五年来,风雨兼程,饱经沧桑。建国后,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给予了至高无上的关怀和重视。其间,两百多家单位精诚协作,五千多名专家共襄盛举,众多学界巨擘投身其中。他们不辱使命,呕心沥血,共同谱写了中国文化建设史上的光辉篇章,成为举世公认的典范之作,是迄今为止我国最具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

这支遍布全国的精英队伍,既为人杰,又为人梯;既是专家,又当苦力。几十年来,他们淡泊明志,兢兢业业,披经阅典数十万册之巨,编制各种资料卡片非车莫载。中途数易其人,前赴后继。他们一如勤于稼穡的农夫,用双手和汗水讴歌着劳动和劳动者的伟大,用辛勤和智慧装点着创造和创造者的神奇。不少学界栋梁毕其一生、鞠躬尽瘁,哲人其萎,甘苦谁知?无论他们的人生道路多么坎坷曲折,无论他们的经历有多少离合悲欢,无论生活给予了他们怎样的待遇,《辞海》都将折射出他们的生命亮点,把他们的人生价值提升到一个堪称辉煌的高度。这是因为,他们用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人格力量和敬业情操铸造了一部灵魂的大典,形成并高扬了伟大的“辞海精神”。江河流芳,天地共鉴。

作为人类文明的忠实载体,《辞海》遵循国际惯例十年一修,以及时吸纳世界科学文化研究最新成果,培植其权威性的牢固根基。自1979年始,每一次新版都镌刻着共和国的一秩年轮,伴随着中国迈向世界、走向未来的激越之声。每一次修订又都是一次新的超越和突破。几经修葺,更臻精美。而今新版告竣,以一百多个学科为骨架,12万多个词条为脉络,构成了一个血肉丰满的文化巨人。一切热爱知识的人们,都可以依偎在这个巨人的身旁汲取营养、磨砺心志、启悟人生。《辞海》的价值和它所承载的使命,是任何人都无法进行量化估计的,而任何人都可以沐浴它的智慧光芒。它的意义和作用通过千百万人的使用逐步生发、扩展和放大开来,人们只能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感受到它的强大存在。

第一章 跨越新世纪的文化准备

1. 战前总动员

1996年4月6日。上午。上海市政协礼堂江海厅。

《辞海》分科主编会议正在这里举行。辞海编委会主编夏征农，副主编马飞海、王元化、石美鑫、杨福家、李国豪、束纫秋、巢峰，以及上海、北京、南京、杭州、淮南、青岛等地的分科主编共二百多人济济一堂，使会议气氛显得热烈而庄严。但大家注意到，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副主编朱物华、刘佛年、苏步青、李储文、周谷城、钱伟长、翁史烈、谢希德未能到场，他们都是因事因病请假的重要成员。此时罗竹风已进入癌症晚期，正在生死线上与病魔抗争，即便如此，他还在病床上写了一份书面发言；副主编钱伟长专门从北京发来了信函，表达了对《辞海》修订工作的关心和愿望。

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有：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谈家桢，市委、市府副秘书长周慕尧，市教委主任郑令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贾树枚，市委宣传部秘书长钟修身，市新闻出版局党委书记郭开荣，局长徐福生、副局长孙颢等。此外，担任《辞海》编写和修订工作的上海市各高校、中科院上海分院等编写单位的领导同志姚泰、王邦佐、汤章城、邵世煌等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强大阵容决定了它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辞海》编委会举行的各种会议中,不乏这种高朋满座,专家云集的场景,本次会议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它之所以显得十分重要,是因为它的深度和广度,是因为它是本世纪末最重要的一次分科主编会议。此时是1996年4月6日,离国庆五十周年的1999年10月1日还有三年零五个月。对于编纂《辞海》(1999年版)这件艰巨浩繁的工作来讲,已进入倒计时的阶段。此前已经召开过数次大大小小的会议,现在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分科主编都请来,把参加单位的负责人都请来,把涉及这项工作的方方面面领导都请来,发言就成了表态,就要说话算数,一锤定音,就成了不是军令状的军令状。因此,这次会议就成了决战前的动员会。

受主编夏征农和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的委托,副主编束纫秋主持了会议。副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巢峰作了工作报告。巢峰在报告中阐述了《辞海》(1999年版)的总体目标:与《辞海》(1989年版)相比,要实现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更新,要有脱胎换骨的变化,成为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换代性的重点文化产品,从而为我国辞书事业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并以此告别20世纪,迎接21世纪的到来,向建国五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目标十分明确,《辞海》(1999年版)的编纂就是向一个新的高度的冲刺,就是一次跨越新世纪的文化准备。它很庄严地向世人回答了一个问题:下个世纪的中国人用什么工具书?

会议的主题烘托着会议的气氛。大家都明白这个时间概念:满打满算,只有三年零五个月。时间紧,一天都不能拖;任务重,谁也不能动摇。用一位副主编的话说,“这是铁定的死

任务。”会议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因此，无论是陈至立、金炳华这些市委领导，还是夏征农、束纫秋、巢峰这些主编、副主编们，面对在座的二百多位分科主编和相关单位负责人，他们心中都有一句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完成这次任务，就要拜托各位了！”

此时，巢峰的心里极不平静。他既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又是《辞海》（1999年版）的组织者之一，肩上的担子压得最重、最具体。千头万绪的工作绝非一个人、一个单位的力量所能及的，需要上级党政领导、各分科主编和各参加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因此，他脑子里的这根弦绷得很紧，时刻关心着会议的效果和质量。这一年他已是69岁的人了，看上去怎么也不过年近花甲，他的眼睛不时地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交换着“意见”，深邃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充满了对大家、对这项工作的真诚期待。

复旦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福家率先发言。他说：“编纂《辞海》是国家的一件大事，也是一件有难度的大事。作为复旦大学的校长，我将全力以赴支持学校的各位同志把《辞海》的工作做好。”杨福家在“难度”二字上加重了语气，因为是一件国家大事，那就绝不是一件轻松活儿。

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谈敏、上海交大沈志广教授等纷纷发表了意见。军事科学条目一直由中央军委授权军事科学院负责实施，军事科学院的与会代表李英说，根据上海市委的请求，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等已于3月21日在报告上签字批示，《辞海》军事条目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负责牵头组织。李英表示，虽然军事科学院承担着其他许多任务，他们将一如既往地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把《辞海》军事部分的任

务完成好。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福生说：“对于《辞海》这项知识界、出版界通力协作的大工程，市新闻出版局将给以全力支持，帮助上海辞书出版社保质按时完成好 1999 年版的编纂出版工作。”上海市教委主任郑令德说：“新版《辞海》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工程，是代表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性产品。《辞海》与教育关系非常密切，市教委十分关心和积极支持此项工作。我们将与作者一起全力以赴、同心协力，保证高质量地完成任务。”

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金炳华说：“编纂《辞海》这一大型综合性辞典是我们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文化工程。我们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帮助读者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非常重要，对广大干部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是非常有益的优秀教材。”他进一步表示：“《辞海》是上海出版工作的一项重大精品工程，要抓好落实，市委宣传部一定全力以赴加以支持。希望通过这项工作，在出好书的同时，带出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新的作者队伍、编辑队伍，以适应当前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

陈至立发表了重要讲话。她说：“近年来，上海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如博物馆、图书馆等硬件正在陆续建成和布局，在软件方面《辞海》是最大的工程，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最近市常委会又郑重研究，决定财政拨款一千万元来支持这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工程。《辞海》是全国学术界通力协作的产物，中央各部委包括解放军研究机构和许多兄弟省市的同志一起参加这项工作，对此，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同时，也希

望大家坚持三老四严的科学态度、非常细致的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把工作做好，使新版《辞海》达到新的水平，向建国五十周年献礼并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陈至立的讲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也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经费问题是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辞海》修订工作中遇到的一大拦路虎。整个修订预算超过 2000 万元，上海辞书出版社自己解决一部分，但尚有很大缺口。为此，辞海编委会主编夏征农，常务副主编罗竹风，副主编苏步青、周谷城四位老先生联名致函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请求给予资金支持。黄菊马上批示“应予支持”，并请有关部门提出支持的具体办法。现在，市委、市府明确表示财政拨款一千万元，主编、副主编们心里悬着的石头也就落了地。新闻出版部门的人都清楚，政府拨款一千万元支持一本书，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它不仅体现了市委、市府对这项工作的高度重视，同时也表达了党和政府对大家的殷切期望和信赖。

大会间隙，陈至立走到巢峰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巢峰，这就要看你们的了。”

巢峰说：“有市委领导的支持，有各方面的配合，我想，完成这次任务应该没什么问题。”

巢峰的回答是坚毅的，沉甸甸的。完成这样浩大的文化工程，绝非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而上上下下的支持与配合就是完成这次艰巨任务的根本保证，也是作为重要组织者的他所仰仗的强大后盾。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新闻界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各种传媒纷纷在显著位置迅速报道了新版《辞海》编纂工作全面启动的消息。新华社播发了全国统发稿，《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数十家新闻媒体详细介绍了新版《辞海》的主要特点。报道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中央各部委到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从繁华都市到偏僻乡村，祝贺和建议的信件像雪花一样飞来，形成了一股热浪。科学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周明鉴先生当时正在美国探亲，看了《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消息后，马上写信给辞海办公室。他在信中说：“这件大事又是即将载入史册的里程碑，谨致祝贺。”表示“希望能在这项大工程中略尽绵力，这将是一种荣幸。”正在加拿大讲学的天津医科大学教授耿贯一先生立刻致函辞海编委会表示祝贺，还对流行病学中的有关词目的处理提出了建议。还有不少从事教学和科研的同志寄来了自己的文章，供编纂者参考。黑龙江省行政学院的田忠侠教授寄来了五篇题为《辞海考辨》的系列论文，对数百个辞条逐条辨析，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青岛铁路分局工程师王凤岗同志对《辞海》情有独钟，收藏了《辞海》的各种版本。以前两个女儿考上大学时，《辞海》是他送给女儿的唯一礼物，寄托着父亲望女成凤的全部期望。这一次，他对铁路词条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化工部原副总工程师居滋善先生是《辞海》的老读者，他从广播里听到消息后，主动向辞海编委会请缨，“作为《辞海》的受益者，自愿参与新版编辑之盛事，不计名利，略尽绵薄，以为回报。”寥寥数语，尽显赤诚。

如果说，4月6日会议是通过行政组织方式而实施的战前总动员会的话，那么这一封封热情洋溢的来信则代表了全社会的广泛支持与瞩目。这既是渴望，也是呼声；既是信任，又是鞭策。它传达着这样一个重要信息：编纂《辞海》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是众望所归、民心所向的世纪盛举！

2. 时代需要一部《辞海》

《辞海》从1936年出版之后,1947年出版过合订缩印本,再后来有了1979年版、1989年版刊行于世。对于普通读者来讲,他们未必知道版本之间的差别,也毋须知道这些差别。无论是哪种版本的《辞海》,在广大读者心目中都是神圣的。他们的书架因为有了《辞海》而倍添光辉,他们的学习因为有了《辞海》而事半功倍,他们的工作因为有了《辞海》而如虎添翼。尤其是在人们的工资收入普遍较低的时候,购置一部《辞海》无异于购置一种大件家具,其支出必须纳入家庭财政预算。

1979年版《辞海》出版之后,陕南某贫困县新华书店一次分配了十套。经理如获至宝,立即采取了“一支笔”签字的措施,这个措施原本是适用于公司“财务报销制度”的。此法移植于《辞海》的销售,是为了集中权利,照顾关系户。书店经理就是用这种办法,给县人事局长批了两张条子,居然给店内某职工的家属安排了一个很不错的工作,使长时间困扰他的待业之忧迎刃而解。有幸买到《辞海》的人,除了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舍得智力投资外,还要与书店经理关系不薄。那洋洋自得的神态自然是溢于言表的了,且一点不亚于后来在经济大潮中出现的“大哥大”现象,人们用它来标榜自我,显示身价,当成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只是它们的文化与经济的含量不同罢了。

同样是在这个县,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姓周的小伙子酷爱读书,1980年考入某师大。毕业后分配到县文化